

所谓诗意，有时是澄澈晶莹的一泓春水，有时是飞扬眷恋的漫天雪花，有时是吹向太阳的激越号角，有时是一泻千里的怒涛春潮……对于叶圣陶这位时时被小说家、散文家、教育家、编辑家之类盛名遮蔽的诗人而言，或许就是他那极其独特的对人和人生的深情依恋，由此升华为动人心魄的乐享，简言之，也即人的诗化与诗的人化！当我们走进他晚年创作的大量旧体诗词的时候，这种感受就会扑面而来，并且掩卷弥深！

1966年8月2日，在那场毁灭文化的“大革命”席卷全国不久，叶圣陶与林砺儒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副部长一起“靠边站”了，从此，忙碌一生的叶老，就真个步入了“赋闲”的日子！而写诗和抄书，就成了这些痛苦寂寞的岁月里叶老最主要的生活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1976年6月到1985年8月（此后因为视听俱废而只好罢笔，再无诗作了），他写出了160题249首（阙）旧体诗词，对于一位耄耋老者来说，这绝对是多产、高产的成绩！

他在诗词里深情地怀念、记诵的友人，有的是髫髻旧友，如章元善、王伯祥、顾颉刚，有的是书业知音，如郭绍虞、吕叔湘、贾璋璋，有的是文坛巨子，如茅盾、俞平伯、臧克家，有的是艺术家，如新凤霞、刘海粟、陈从周，健在者如冰心、巴金、丁玲、李健吾，已逝者如老舍、朱自清、丰子恺、柳亚子……1974年12月28日之夜，叶老失眠了，因为从老友俞平伯的书信中忆及1921年与朱自清在杭州第一师范共同执教的旧事，酝酿推敲，商酌润色，挥毫泼墨，一直到1975年1月5日，才算了此心事，这就是那感人至深的《兰陵王》：

**猛悲切**，怀往纷纷电掣。西湖路，曾见恩招，击桨联床共眠月。相逢屡间阔。常惜、深谈易歇。明灯坐，杯劝互殷，君辄沉沉醉凝睫。

**离愁**自堪磨。乍讲舍多勤，馀海遥涉。鸿鱼犹与传书札。便八表尘空，万流腾涌，蓉城重负辱敬接。是何等欣悦。

**凄绝**，怕言说。记同访江楼，凭眺天末。今生到此成来劫。念挟病修稿，拒粮题帖。斯人先逝，世运转，未暂瞥。

1921年11月，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委托朱自清函邀叶圣陶任教，很快得到叶的回信，说是“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夏天还是冬天”。乐莫乐乎心相知，在那样一个污浊纷乱的世间，却不期而遇得到这样的友朋，其欣喜为何如？很快，两位新诗人先后走进了杭州一师。学校本来给叶圣陶预备了一间宿舍，但鉴于友谊不耐孤寂的他，却建议把自己的宿舍当做共同的居室，而把朱自清的房间当做共同的书房。从此开始了他们一段联床共饮畅怀深谈的难忘岁月。他们有时品茗对话，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有时各据一桌预备功课批改作业，在语文教学的天地里畅游。休假时节，或者去饭馆小酌，或者到西湖泛舟。“西湖这地方，春

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他们都不是初游，但现在因为有了挚友为伴，兴致不同于往常。这年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晚，他们又乘一叶扁舟来到静静的湖上，月华如水，软波似银，远山淡淡，渔火点点，叶圣陶触景生情，口占两句：“数点星灯认渔村，淡墨轻描远黛痕。”这首诗、这景，仿佛触动了彼此心灵深处的弦索，一种对人生、对艺术的感悟，在氤氲的夜色中袅袅升起，善谈的朋友也都缄默了，只听得均匀的桨声在清凉的湖水中起落。到得净慈寺畔，弃舟登岸，经声佛号与木鱼铜磬似乎依然盘旋抑扬，释迦的金身环绕着冉冉的烛焰和烟霏，庄严而又悠远，空灵而又神秘。这时他们的感受，与湖上的夜景、舟里的心境，又大不相同了……胜地佳境的游散，上下古今地“深谈”，确是他们共同的嗜好，也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这就是“击桨联床”的本事，是他们世间难得的交谊的正式开始。后来强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蒙难，时局板荡，他们辗转流离不期而竟一起飘零于成都，茶酒互访评时局、诗词酬唱舒愤懑之余，还留下了两部共同执笔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作为事业与友情的佐证。后来时空阻隔，一在京，一在沪，仅依靠鱼雁往来，互通款曲，但朱自清抱穷病之身却拒领美国救济粮的凛然义举，早就让老友们肃然起敬了……

1927年夏，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李尧棠从巴黎移居沙多居里，玛伦河畔平静的岁月，使他的身体得到了休息，却并未窒息他燃烧的心灵。对祖国的苦念，对纪念格尔、苏菲亚等民粹党人的敬意，大哥信中的感伤和温情，混和并酿化成一杯烈酒，他取名《灭亡》，署名巴金，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经取索，希望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酬来自费刊行。叶圣陶在开明书店一见《灭亡》的原稿，即刻拍板，决定1929年1月号起在《小说月报》连载，并且亲自为之撰写广告：“《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巴金从未想过自己的处女作能够在当时历史最

久、影响最大、销量超过万份的大型文学杂志发表；而这一发表，也就决定了他终身从事的事业，却处在这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新的辉煌。1981年，他他在致《十月》编辑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说：“我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讲过了我怎样走上文学的道路，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深渊，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50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但他也很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卸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啊！’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巴金：《致〈十月〉》，《十月》1981年第6期）

1977年12月2日，叶老给派遣女儿前来“索书”的巴金特意作诗并书而赠之，诗云：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淡，五十年。平时未义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刊，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蛰蛰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他是文学青年的巴金的引路人，他又是横遭劫难的巴金的守护神，他还是晚年巴金文学常青树的虔诚而辛勤的园丁！

还有丁玲。当年她南北漂泊，时而就读，

时而自修，呼吸着“五四”以后自由而又苦涩的时代空气，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中国的天地是那么寥廓广大，但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却处处感受到压抑、窒息的苦痛，体尝着感伤和消沉的折磨。在福楼拜、小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诸多名家、名作启迪下，她心中孕育已久的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置身黑暗渴望光明苦闷彷徨挣扎幻灭的心灵历程，开始酿化为以苦闷和反抗为基调的小说，第一篇便是《梦珂》。1927年秋完成这处女作后，即投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对于这素不相识的作者的自投稿件，却慧眼独具，马上发表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十二号，并且给以创作第一篇的重要地位。对于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支持和鼓励更为切实有力？于是，丁玲迅即写出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又被刊于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二期的“头版头条”，排在陈望道译文和矛盾的连载小说《动摇》之前。第三篇《暑假中》，“头版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头版头条”。四发四中，开创了《小说月报》创办以来几乎从未有过的先例，恐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有的美谈。四篇小说，初步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出众的才华气质，也代表着中国现代小说一种新的流派的端倪初露。于是叶圣陶向丁玲提议，将这四篇小说集印一册，以广远行。这是丁玲想也没有想过的，自然万分同意。于是，包括上述四个短篇的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10月便由上海开明书店（叶圣陶就是该店编译所的负责人！）初版印行。当《梦珂》等篇发表时，叶圣陶曾细心地在作品之末缀一“留”字，意在保存版权，不允转载。未雨绸缪，为后来的编集印行预设伏笔，更见出长者扶助青年的良苦用心。正是在这种无私的关怀支持下，丁玲才一发而不可收，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二代女作家的代表，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关注。1929年初，钱玄邨等批评家便开始撰文评论，有的称之为“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有的赞扬其“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30年代，丁玲的名字已经毫无愧色地排列在“现代女作家评传”的目录之上。

当时，叶圣陶寓居上海横浜路景云里，丁玲夫妇数次造访，都受到殷勤地款待。叶圣陶的儿女至善、至美、至诚，也由此熟识了这位新进的女作家。1928年9月29日，叶圣陶与丁玲、胡也频、王伯祥、周予同、贺昌群、徐调孚等同乘快车往浙江海宁观赏钱塘江湖，豪兴如潮，潮头如雪，一带汪洋作证，文坛佳话长传。此后，风雨晦明，波峰浪谷，丁玲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享盛誉，而遭雷击……1979年5月26日下午，丁玲经历了在北大荒劳改、在京郊坐监、在长治“遣送”重重磨难之后，突然敲响了北京东四八条71号叶宅的大门。85岁的叶圣陶和75岁的丁玲蓦然聚首，喜极而执手无言。半晌，丁玲才几

分幽默几分辛酸地说道：“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丁玲的来访，激活了叶圣陶半个世纪的回忆，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夜不能寐，午夜醒来，吟成《六么令——丁玲见访，喜极，作此赠之》：

**启关狂喜**，不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别，所患难消渴。不须怨绝。免毫在握，赆续前书尚心热。

**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撤。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

    他喜欢读冰心的作品，是在20年代；初识冰心其人，则在40年代；50年代以来，他们共居京华，会场书市，常能比肩。冰心每有新作，必签名相赠；叶圣陶视力衰退，无法仔细阅读，只有悉心收藏这样的“签名本”，作为欣然的纪念。1983年6月25日，作诗《冰心大姐以新印散文选相赠作一律奉赠》，说的就是上述经历与情怀。诗曰：

**爱诵冰心作**，今逾六十年。嘉庐初识面，京市每联肩。书出必相赠，目昏只自恋。悉藏签名本，念此始信然。当日日记云：“冰心托志成带来新印成之《冰心散文选》赠余，作一律谢之。此诗完成极速，为向所未有。”诗写得快，乃缘蕴蓄已久，如水就下，一泻而出，果然痛快淋漓。1984年11月1日，冰心托花店送月季花为圣翁祝寿，叶发函回谢：

**冰心大姊尊鑒：**  
    **顷接惠贶鲜花**，插之于二瓶，**鲜艳葩郁，满室生辉。心感厚意，辞难宣达，伏乞亮察。敬请**

**著安，并祝**。    **福。**  
    **叶圣陶拜启**    **十一月一日上午**  
这是他写给冰心的最后一封信了。1985年3月，叶圣陶住院，冰心一连多年习惯，停止写作，与女儿吴青到医院去探望，话语无多，友情深长。到这时，“五四”时代的老作家仅余叶、谢二人了！他多么想走出病室，与她共赏春花，可惜又成虚愿，诗中不胜惆怅：

**廊外春阳正病房**，**今年又负满庭芳。**  
    **章俞二老冰心姐**，**仍歇虚邀看海棠。**

已是九旬开外的老人，何所求于人间而念念不忘于“春阳”、“海棠”？惟人情为不能弃耳！上世纪20年代末，曾有年轻气盛的评价家说叶老的小说是“厌世”之作，叶老心不能平，乃特意自命小说集为《未厌集》，并多次表白：“这个世如何能厌？”1957年3月，多年厮守堪称“天作之合”的夫人胡墨林女士撒手人寰，叶老悲痛不已，亲手为之题写了墓志铭：“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这其实正是他已内心世界的写照！因人有情而万物可亲，由情及人而是处生动。写诗做人，到得如此境界，堪称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了。

有种种花样，有“命题对”，如以“青蛙”或“雨傘”为题目做一对对子；有“嵌字对”，如以“小红”或“如意”嵌入上下句，做一对对子。最难的是把不相干的字句嵌入上下句中，做一对对子，例如上句嵌“天”，下句嵌“花”；上句嵌“初听起”，下句嵌“暖暖”，本来不搭界的字和词，做成七字对或十四字对，难度就大了。“盟主”点燃一支香，用以计时。这支香烧完了就要交卷，延宕或做得不合格的就要罚酒。对对子和做诗钟，虽属雕虫小技，然以之谄性灵，涤烦躁，亦不失为“艺苑之支流，尘海之逸兴”。对对子最能显示中国文字的特征。能对对子才能分辨虚实字，平仄声。对子的拙巧、朴华、雅俗，可以看出读书之多寡、语汇之贫富，以及才思聪慧的程度和审美情趣的高下。这种游戏能练习做诗的基本功，使才各显其能，优者雀喜，劣者苦醪，互为评点，自有一番情趣。妙句出，意蕴生。对对子若有信手拈来，浑若天成的本领，诗一定做得很雅洁。

    放社刚开始时只有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吴宾若几

人对来势汹汹的复古思潮，叶圣陶写了《关于读古文》等议论文，极力反对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反对“旧瓶可以装新酒”的论调。虽说有点偏激，但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是一大批“与时俱进”的作家们的共识。

抗战爆发后，叶圣陶举家入川，旧体诗才多起来，内容大多是写“流亡”中的见闻、爱国忧民、严辨夷夏的思想情感，以及朝夕怀想、时萦梦寐的思乡念友之情。在1937年7月至1946年2月前后8年又7个月的“流亡”生涯中，叶圣陶写了很多旧体诗词，仅收入《叶圣陶集》第8卷的就有60余首。因为青年时代旧体诗词写得多，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古典文学的修养较高，爱国主义思想十分炽热，对朋友最讲亲谊，又得江山的助，所以一写出来便不同凡响，深得林宰平、俞平伯、王了一诸位先生的赞赏。如《江行杂诗》用字“拗救”、“隽绝”（王了一、林宰平语）、《今见》“惯家句调，如饮醇醪”（林宰平语）、《至善满子结婚于乐山得可翁寄诗四绝依韵和之》“风规高迈”（林宰平语）、《游青城口

# “抗战词史”中的“绝唱”

## ——叶圣陶抗战八年间的诗词

### □商金林

个人，同窗好友知道后纷纷要求加入，“结社”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1910年春，草桥中学放社正式成立。除王伯祥、顾颉刚、吴宾若之外，江应干、乔笙亚、章君畴、吴潮帆、张吉如、张禹琳、庞京周等一批“朝同学，夕同游”的朋友也都成了“放社”骨干。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这些以“中华男儿”自励，“誓将只手擎天空”的学子，在“盟主”叶圣陶的带领下，经常举行社集，作文、作诗词、作画、刻印章、习字、吹箫；谈国内之“水灾”、“兵荒”、“暴动”；谈国外的“名人伟业”；谈民族前途，你争我辩，“往往至数小时”，从而也孕育了许许多多的诗篇。叶圣陶当年写的旧体诗多达好几册，虽说只选了50余首冠以“少年稿”的集名《叶圣陶集》第8卷，但读后仍能感受到作为诗人的叶圣陶卓越的才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叶圣陶成了文学研究会“读书会、诗歌组”的成员，1922年1月与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一起创办了我国新诗史上第一份新诗刊物《诗》月刊，作为新诗的“歌舞繁育之场”。那时叶圣陶竭力提倡写新诗，虽说也意识到“旧形式可供资鉴”，但绝不写旧体诗。直到1929年12月28日，为了答谢施蛰存馈赠鲈鱼的盛情，才在信中附了“五四”以来写的第一首旧体诗，诗云：“红腮珍品喜三分，持作羹汤佐小飧。滋味清鲜何所拟，《上元灯》里诵君文。”1936年5月，这封信（连同诗）由孔另境编入《现代作家书简》（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西北风》杂志的编辑看到了，擅自改题名为《施蛰存自松江饷以鲈鱼，书一绝以赠》，连同叶圣陶1936年10月写的旧体诗《挽鲁迅先生》，一同在《西北风》第13期（1936年12月5日）发表。答谢馈赠鲈鱼的诗笔调轻松，诙谐幽默；挽鲁迅的诗写得极其恭敬，写作时间又相隔了7年，登在一起实在不那么庄重。这大概是编辑们的“拉名家”花样，不是作者本意要发表的。从1917年到1937年抗战前夕的20多年里，叶圣陶自己发表的旧体诗只有《挽鲁迅先生》一首。1930年代初，面

占》“洒落有味”（俞平伯语）、《乐山寓庐被炸移居城外野屋》“躬历艰危，不减平素之雅怀，无颓唐音，无客气语，贞固夷粹，令人兴感。若风格出陶、杜间，如诵《羌村》《彭衙》等篇，犹其余事耳。”（俞平伯语）、《彬然治圃桂林百岩山》“得盛唐正趣”，“冲淡绵逸，是善学陶者”（王了一、林宰平语），等等。总之，叶圣陶“流亡”重庆、乐山、成都期间写的旧体诗，可以作为“抗战词史”来读。请看1939年11月4日在乐山写的《水龙吟》“举头黯黯云山”）：

**举头黯黯云山**，秋心飞越云山外。风陵渡口，洞庭湖畔，捷音迟至。战士无衣，哀鸿遍地，西风寒厉。听连番烽警，惊传飞寇，又几处、教摧毁。  
    **怅恨良朋悠逸**，理舟车、愿言难遂。两窗剪烛，春盘荐韭，谈何容易。江水汤汤，写愁莫去，够尝滋味。更何心、怀土悲秋，点点酒、无聊泪。

    当天的日记中说：“下午，作成《水龙吟》一首，写近怀。首二句得之已久，自以为切合当前情景”。写这首词完全出自心有所感，意有所触，情有所激。时值初冬，阴暗的云山更增添了诗人的愁绪。抗战已经两年了，不但最初的鞭痕没有半点平复，而且创伤的范围越来越大，山西境内黄河北岸的“风陵渡”，以及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均为主要战场。前方，西风寒厉，战士无衣，哀鸿遍地；后方，警报频传，敌机不断地狂轰烂炸，人民的生命财产化为寒烟。烽火连天，叶圣陶与滞留在上海的朋友们离得越来越遥远了。前途茫茫，东归无期，想象有一天久别重逢，接受老朋友的殷勤款待，又谈何容易。汤汤江水，流不尽亡国之恨，徒然愤恨，只能抛洒忧伤而又“无聊”的眼泪。《水龙吟》写的是诗人的“近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最痛切的国难。中华民族之忧虑和悲痛，读来令人深思。

“清真沉厚”，是叶圣陶“流亡”期间的诗词的另一个特色。作者戴着镣铐跳舞，“斟唐酌宋”，古为今用，刻板的形

式在叶圣陶手里成了随心所欲抒写新的内容和新的情感的利器，“旧瓶”装上了“芳醇”的“新酒”，非但没有陈旧的涩味，反而显得清新可喜；朴实而有“芳润”，言有尽而意无穷，请看1939年12月15日在乐山写的《浣溪沙》四首）：

**曳杖铿然独往还**，**小桥流水自潺潺**，**数枝红叶点秋山**。  
    **渐看清霜欺短鬓**，**稍怜瘦骨怯新寒**。**中年情味未阑珊**。  
    **终日无人叩竹扉**。**家鸡邻火偶穿篱**，**罗阶小雀亦忘机**。  
    **观钓颇逾垂钓趣**，**种花何问看花谁**？**细推物理一凝思**。  
    **野菊芦花共瓦瓶**，**萧然秋意迹疏疏**，**粉墙三两欲侵篱**。  
    **章句年年销壮思**，**音书日日望遥青**。**可堪暝色压眉棱**！  
    **几日云阴不开**，**远山愁黛锁江隈**。**乡关漫动度郎哀**。  
    **风叶洒空疑急雨**，**昏鸦翻乱似飞灰**。**入房出户只徘徊**。

1939年8月19日，日寇飞机轰炸乐山，乐山城内“炸去三分之二”，“死伤甚众”。叶圣陶的“寓庐被炸”，“所有家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只好移居“城外野屋”。词中“小桥流水自潺潺”，“终日无人叩竹扉”，“家鸡邻火偶穿篱”，“野菊芦花共瓦瓶”都是写实。诗人“离群索居”，虽说当时在武汉大学教国文，分章析句，解释文章，但这完全出自被迫和无奈，“章句年年销壮思”，为此感到异常的烦躁和挥之不去的寂寞，诚如他在1941年10月4日写的五言诗《二友》中所说：“虽居稠人间，何殊孤岛守？”于此“孤岛”中，仅得“手杖”和“烟斗”两个朋友，“慰我无聊时，伴我郊野走”，可见这《浣溪沙》第一首开头的“曳杖铿然独往还”，以及“渐看清霜欺短鬓”、“稍怜瘦骨怯新寒”等寂寞而哀伤的诗句也都是写实。词中融铸了许多典故：“曳杖”句出自苏轼《东坡》：“莫嫌荦确破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未阑珊”出自白居易《咏怀》：“白发满头归得也，诗情酒兴未阑珊”；“罗阶小雀”出自《史记·汲郑列传赞》：“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亦忘机”出自李白《下终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细推物理”出自杜甫《曲江二首》：“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伴此身。”“远山愁黛”出自欧阳修《玉楼春》：“春山敛黛低歌柳”。“乡关”句因契合平仄规律而倒装，实为“漫动度郎乡关哀”，缘自庾信的《哀江南赋》，叶圣陶创造性地借用了这许多典故，可见他古典文学根基极深，满腹经典，善于活用。俞平伯评《浣溪沙四首》，说“用典入微，令人不觉”，这话十分精当。联想到叶圣陶在“流亡”期间写的这些诗词，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古今名句，每从飘泊中来”，“艰难诗万首”等古训，可见作者直面现实，与时代贴得很紧。

也正是因为与时代贴得很紧，叶圣陶“流亡”期间的诗篇既极其沉重写出了民族的灾难，也展现出了民族的曙光。且看1942年5月24日在成都写的《踏莎行  题丁聪所绘〈现象图〉》，现抄录如下：

**现象如斯，人间何世！两峰“鬼趣”**从新制。莫言嬉笑入丹青，须知中有伤心涕。    **无耻荒淫**，有为惕厉，并存此土殊堪惜。**愿君更画半边儿**，**笔端气节如初霁**。  
    是日记中写道：“昨鼎彝交来丁聪所作《现象图》一帧，属余题之。图绘后方各色人物，皆可叹可悲之象。设色，用漫画笔法。讽刺意味甚重。余作《踏莎行》一首，即题其上，又为署端三篆书。”此图现存美国 Kausas 大学图书馆。“两峰”即“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善画人物、山水、梅竹。所绘《鬼趣图》讽刺世态，尤称于史，乾隆嘉庆时名人多有趣味。“无耻”援自鲁迅为肖军《八月的乡村》作序所引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荒淫无耻指统治后方的国民党当局；“有为惕厉”：有所作为，警惕危机，指在边区和敌后坚持抗战和建设人民政权的共产党。国共“并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但“根蒂”却不相同。叶圣陶热切地希望国家用犹如“晴光”一样的鲜亮的笔墨，画出边区和解放区那个“半边儿”的崭新的景象，读来令人鼓舞！“抗战词史”也成了叶圣陶研究重要的思想史料。